

黑集

焦静宜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此书完成于相濡以沫的年华。
近九年春，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上连载我第一个植物学博士论文《
完魏氏老子封连被叔之名》。又师承李学勤先生，
及清以善和圆而叶脉掌状裂甚深，因此得名“
上善若水”。此书完成于相濡以沫的年华。
时间里同夏侯研究领域一搏，也是过了一个坎儿。
因而，及时总结已有研究成果，认真规划今后，是
必不可少的。但此不揣谫陋，对西洋学成之后的
腔名医略，就极于渴前望与同行。

研究工作与著述述录

因耽溺四十年来西洋学的研习，得
之，从整个进境或更研究领域，西洋学成之后的
而居停滞，然若与它有身逢其时，进境，即
欣喜，以为方向如我所占，进境，一无所知，进境，
而实则不然，是第一人。至于我所知，进境，
百二十家篇，而道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我早无以示人，
要是上却早有所示，但相隔久，而此书完成于相濡以沫的年华，
有其美辞，工作如速者进行，别样魂一往，味之，
已在北冥，全而归矣。



星点集

焦静宜 著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系

行止

焦静宜著

2006年夏
于南开园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点集 / 焦静宜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310-02538-5

I . 星... II . 焦... III .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 K250.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93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8.75 印张 4 插页 591 千字**

定价:7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焦静宜，女，祖籍浙江绍兴，1950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曾任南开大学学报编辑，现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审，兼任天津市编辑学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类图书的编辑和管理工作，1997年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及地方文献，先后赴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进行学术访问。主要著作有《北洋军阀史》（合著）、《20世纪初中国的遗老遗少》，主编、参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北洋军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中国历史研究丛书）等，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父亲焦鼎彝 母亲王凤兰

自序

我素喜读书而拙于著述，因此当选辑这本文集时，心中总有一种忐忑。从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年漫长的编辑之路。科研虽非本职，却又时时心向往之。于是每每利用星星点点的业余时间，连缀出了片片断断的文字。现检阅起来，这些当时或出于兴趣，或有所感发，或应人邀约，甚或为参加学术活动而急就的文字，不过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羽，若相对宏阔的学术领域而言，更如同天穹间的星星点点。虽然微不足道，却又敝帚自珍，现将学习所得求教于同道诸友，依其本旨，名之为“星点集”。

正因其星星点点，难成体系，故将所作大致梳理归类，分为六卷。其中已发表过的部分基本保持原状，以忠实于既往的岁月。如《从福州船政局看洋务派所办军事工业的封建主义性质》一文，是1979年冬我第一次参加当时为数不多的学术研讨会并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现在看来不仅文笔稚嫩，且带着“文革”刚刚结束、学术研究重新起步那个特定时期的痕迹，但作为对一个时代的纪念，还是把它收入其中。另一部分内容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曾发表，但考虑到或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也列入集中，如《清末民初名人名著编年纪要（1910～1914）》即属此类。再一部分是编辑手记，虽然篇幅不多，却体现着一个出版人对著作者的敬仰。

“五更归梦三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这是宋人黄庭坚出使汝州时思亲求归的佳句。而我则因父母早逝，难以定省，只能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以《星点集》遥祭我的父母，告慰我的父母。他们以最大的辛劳，鞠育、抚养了我们姐弟六人。父严母慈，其乐融融，是我少儿时最难忘

的记忆。十年浩劫是社会、更是家庭的创痛。虽然父母未享上寿，但是，他们正直、善良的品格和要求子女“好学上进”的言教身教，让我铭记终生。

我感念整整七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虽然备受艰辛，蹉跎青春，却锻炼了体魄。劳动使我自强。

我感念母校——南开大学的培育。尽管当年戴着“工农兵学员”的帽子走进校门，却有幸赶上“文革”结束，得诸名师教导，初登学术堂奥。读书使我自信。

我感念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这个温暖的集体。从这里，我开始了编辑生涯；也是在这里，在初探学术门径的同时，我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

我感念至今为止我供职时间最长的南开大学出版社。二十余年如白驹过隙，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竟不觉从中年开始步入老年。早年编发文稿，或时有所得，或偶发灵感，工作往往成为学习的导引和动力，这样，边干边学，历年积攒下来，竟也有几十万字的篇什。这次清理旧稿，内心仍有一些愧对先人和师长的遗憾，因为尽管这些业余的撰作难登大雅之堂，然而随着年齿渐长，越觉工作之繁重，时有“肩山石压，目轮火爆”之叹，无奈已与学术圈子逐渐淡远。也正因此，感谢南开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使我的耕耘得到了收获。

我更要深深感激的是我的丈夫来新夏教授。他作为老师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在我学术上遇到困难、感到困惑的时候，他给了我鼓励和鞭策。而《星点集》的成书，他有着支持和督促的一半功劳。在这本文集即将付梓之际，他一定最想和我共享这份喜悦。

以上这些文字或许未能免俗，但这确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的人生很平淡，但我所生活的时代却波澜壮阔。在这个时代里，我经历了，我学习了，我思考了。《星点集》是我学习历史的心得，也是自己工作、生活的记录。尽管肤浅，也祈望得到师友们的青览，并给予批评和指教。

· 2006年“五一”写于邃谷

目 录

(335)	梁启超不白眼看袁世凯与孙中山斗争
(336)	袁世凯对李鸿章的评价十二
(341)	孙人龙对袁世凯中立派的批评
(346)	公寓和天理皇帝慈禧从
(347)	德宗景衡和光宗朱
(350)	“慈禧小”西太后谎言
(355)	皇室收入统计表
(362)	慈禧实业演讲稿
(365)	慈禧遇“毒”文稿
(366)	长孙皇后
(367)	李凤楼和慈禧自高
(368)	从福州船政局看洋务派所办军事工业的封建主义性质
(369)	试析辛亥革命后华北地区农村社会习俗的变化
(370)	浅析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
卷一 中国近代史事个案研究	(1)
(371)	略论林则徐的人才观
(372)	林则徐西戍诗浅析
(373)	林则徐与中外文化
(374)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衙斋杂录》与姚莹的《康𬨎纪行》
(375)	“宣南诗社”纪事
卷二 林则徐研究	(33)
(381)	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82)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383)	袁世凯与民初国会
(384)	论“张勋复辟”
(385)	华盛顿会议对中国的影响
(386)	梁士诒内阁与直奉军阀矛盾的激化
(387)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直奉军阀的权力角逐
卷三 北洋军阀史研究	(87)
(391)	56手稿集
(392)	(112)
(393)	(125)
(394)	(133)
(395)	(145)
(396)	(191)
(397)	(219)

北洋人物在抗战时期的不同抉择 (232)

卷四 二十世纪初遗老遗少史迹 (239)

过渡社会中的过渡性人物 (241)

从宣统皇帝到天津寓公 (246)

末代皇后的婚姻悲剧 (254)

宫廷内外的“小德张” (260)

水竹邨人徐世昌 (266)

状元实业家张謇 (290)

北洋之“虎”段祺瑞 (297)

辫帅张勋 (303)

(1) 高自标榜的吴佩孚 (313)

(2) 肃亲王府的女间谍 (322)

(3) 雪堂落水与观堂投湖 (329)

(4) 宦海沉浮的唐绍仪 (336)

附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348)

(5) 清末遗老与民初新贵在天津 (356)

卷五 清末民初名人名著编年纪要(1910~1914) (365)

(6) 1910年 (369)

1911年 (402)

(7) 1912年 (443)

(8) 1913年 (491)

1914年 (537)

卷六 编辑手记 (577)

(9) 集八十年研究成果 括国内外学术动态 (579)

(10) ——《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问世 (579)

(11) 《青州市志》——一方之百科全书 (581)

(12) 一部可信的乡土教材——《天津近代史》 (583)

(13) 漫步紫禁城 (584)

(14)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 1927~1937》简介 (585)

给孩子们点传统文化

- 《中华幼学文库》编辑手记 (587)
推荐《〈草诀百韵歌〉略笺》 (591)
谱牒之学的新建树
——《林则徐年谱新编》编后 (593)
披沙拣金 独具新见
——写在《清人笔记随录》面世之后 (597)
图书品位与选题 (601)
地方文献从搜集到利用 (605)

卷一

中国近代史事个案研究

从福州船政局看洋务派所办 军事工业的封建主义性质

洋务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但要考察它发生的背景，还应当追溯到更早一些时候。从鸦片战争开始，一向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清朝帝国已经被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了大门，这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 使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而国内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运动正使清朝的统治面临覆灭的危机。对于内忧和外患，清政府一向把维持国内统治放在首要地位。当权的恭亲王奕訢的观点就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 故清政府宁愿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镇压农民的反抗运动。就是在那个时候，统治阶级对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有了需求。感到“……进规苏浙，辄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利赖颇多”^③；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④。于是，在“求强”的口号下搞起了近代军事工业。由此背景就很明显地说明了它的目的。在这场运动的开始和过程中，清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甚至斗争，但是，无论是主张“师夷之长技”的洋务派也好，还是主张“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⑤ 的顽固派也好，不论他们在政治主张和采取的方法上有何差异，但都没有丝毫离开要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个目的。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2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 261 页。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96 页。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史学界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分歧，但近来肯定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有促进作用的意见颇多，我想就这一点谈些想法。

其实，对于洋务运动中军事工业的明显的反动作用，以及对商办企业的压制，大家也较少异议，所要寻找出来的积极因素，大概在于它采用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这在中国前所未见，以后则相继发生，其肇始之功似不可泯。这也和目前特别强调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相一致。但我们认为，生产力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而决定生产的社会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生产方式相区别的标志，不在于是否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本身，而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及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目的是为了取得剩余价值；封建主义生产则是以生产资料地主阶级私有制和超经济强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目的主要在于使用价值。生产工具的变革，固然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但决定生产的社会性质的只能是生产关系的性质。比如，在封建社会末期，同样是使用手工工具，依生产关系的不同，可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也可以是行会手工业生产；在现代，同样是使用现代生产工具的大机器生产，依生产关系的不同，可以是资本主义生产，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生产。而且，生产力是和生产关系的突破交相为用的，也就是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单纯地把某种先进生产力强行纳入一种并不适应的生产关系中，它是不会发生什么社会和经济作用的。洋务运动，特别是它的主体军事工业部分，给予我们一个机会来说明这一看法，也只有在中国，在那个特定时期，本来是可以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革的生产力，却完全溶化在封建生产关系的一潭死水之中，没有激起什么波纹，只成为一堆泡沫而已。

洋务运动一开始，颇有势头，接连办了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四大工厂，皆为官办的军事工业。其中的福州船政局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船舶制造厂，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舶，设备完整，门类齐全，编制管理也能自成系统，它不仅是当时军事工业的典范，而且至今也还受到国外历史学家的特别重视，认为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早具有这等规模的制造工业。我们剖析这样一个典型，更可说明洋务派工业并没有因生产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其封建主义性质。

福州船政局由左宗棠始倡，于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十三日奏请朝廷核准。当时清政府正讲求练兵自强，当即下谕照办，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兼督办船政一事。后因左奉命调任陕甘总督，便举荐沈葆桢为船政大臣。沈到任后，立即择地建厂，雇聘洋匠，苦心经营。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船厂已初具规模。计建锤铁厂、拉铁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造厂、钟表厂、打铁厂、转锯厂等，造船厂有船台三座，另有储藏所、砖窑等辅助设施^①。聘法国人日意格（P. Giquel）、德克碑（P. D'Aiguebelle）为正副监督。开始由洋匠指挥制造，按照合同规定，在五年内必须造成150马力轮船11只，80马力轮船5只。中途经浙闽总督英桂建议，将7号150马力轮船改为250马力，计工料巨繁，所以以一只抵两只计算。迄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半年，共造成250马力船1只，150马力船9只，80马力船5只。其间，按原约规定，设立了求是堂艺局，培养中国员匠，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管理等技术。同年七月以后，福州船政局由中国员匠自办。在这个时期内，造船工作由初期木肋轮船进而为铁肋轮船，后又仿造新式快船，最后还曾造过更新式钢甲兵舰。此后的二十多年，又造成船20只。但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部分厂房一被法军炮火击毁，福州船政局即一蹶不振，永远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价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船政局的资金来源。福州船政局是由清政府拨资开办的。开始政府拨付经费银47万两，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常年经费由闽海关每年拨银5万两。因海关款项短缺，不敷支给，时常不及一半。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虽经船政大臣沈葆桢、提调道员夏献纶力求撙节，但“每月尚需实银七八万两”^②，而且是“旧欠者杳无可指，新欠者日且递增”^③。由于积欠太多，拮据无措的窘境成为历任船政大臣首难之事，每每上奏，无非陈述款项实难，船厂无以维持等语。清政府无奈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银2万两^④。至光绪四、五年后，闽海关每月解银不到半数；及至裴荫森时，每年只解两三月；至最后两年内，甚至每年只解1万两，不得已时只好靠他处托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395～397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434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436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425页。

造船只或修船的偶得之款暂且挪用，勉强维持。曾国荃体察其中之情曾说：“……苦吁拨付，幸而得请，不过三分之一，到手辄空；如其不然，岂非燃眉在即。但养船一项，窘迫已至于此；此外，整修船只炮台，妙手空空，其势万难兼顾造船，想执事闻之，代之扼腕也。”^① 船政局完全是依附于封建王朝的拨款来维持，本身丝毫没有增殖的能力，结果是拨款多则多生产，拨款少则少生产。如下表所示：

福州船政局经费收入与产品情况对照表

时 间	应拨数 (万两)	实拨数 (万两)	平均年 收 入 (万两)	产 品 数 (只)	规 格
1866.11 ~ 1874.6	不详	536	69	15	皆木胁兵船
1874.7 ~ 1877.12	不详	169	48	5	其中木胁兵船 4, 铁胁兵船 1
1878.1 ~ 1879.12	不详	96	48	2	铁胁兵船、铁胁商船各 1
1880.1 ~ 1880.12	不详	不详	不详	1	铁胁兵船
1883.1 ~ 1885.12	185	63	21		
1886.1 ~ 1890.12	310	166	41	7	铁胁兵船 2, 新式穹甲舰 1 双机钢甲兵舰 1, 巡海快船 3
1891.1 ~ 1895.12	310	118	24	4	浅水舰 2, 新式穹甲舰 2
1895.1 ~ 1896.12	不详	不详	不详	1	铁胁运粮快船
1897.1 ~ 1898.12	125	57	29		
1899.1 ~ 1902.12	245	77	19		

注：根据《船政奏议汇编》所载船政大臣历年报销折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 405、423 页附表编制。

资金在封建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就使船政局处在封建的经营方式与近代工业本身的客观要求之间所发生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主要表现为：（一）在资金方面，“以经费之盈绌，为工程之繁简”^②，丧失了企业的自主权。这个问题前面已涉及，此不赘述。（二）由于它不是作为商品生产，所以船政局的款项收支“实用实销”，没有任何成本核算。购入物料“并无合同单据可检”^③，商局领取船只“无庸租价保险”^④。为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 497 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 410 页。

③ 《船政奏议汇编》卷一。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 474 页。

他厂造船，也以“制船用船均属公家，自无庸两相计较”^① 为由，取消了企业间的单独核算。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福州船政局为北洋海军修造船只，还称“以公家之款拨作公家之用，何取此疆彼界，稍存畛域之分！”^② 这种貌似冠冕堂皇的“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在封建关系居于统治地位时期，完全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原则背道而驰。船政局虽然表面上也有账目清单一类的东西上呈下转，甚而细至厘微，但实际上，在封建统治下，可以说当时全国只有一个核算单位，就是清政府，而船政局这样的官办工业只不过是它的一个记账单位而已。没有追求剩余价值的冲动和竞争的压力，就不会有严格的经济管理，也就必然有铺张浪费、生产混乱的弊端发生。建厂之初，一切听信洋人，物料必购自外洋。船材、煤炭要由缅甸、暹罗运来，机器、仪表全部来自英法。取材荒裔、重洋辽迥，常因“木料购自外洋”而使工程“未能猝办”^③；且洋匠择材务精，“稍不中绳墨即弃而弗收，甚有工程甫半，忽思变更，营造既成，改求新异”^④。更有中国官员从中渔利“甚于商贾”的行为，“明知国帑之当重，竟敢于靡国帑，明知要工之不可误，竟敢于误要工”^⑤。如此混乱，生产难以正常进行。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刘坤一在复刘荫渠的信中透露，船政局“竟有积重难返之势，非旦夕所可振顿”；他指责“何以历任船政大臣不一讲求利弊？”^⑥ 今天看来，船政利弊是很难责怪生产过程本身的。（三）既然不是从事商品生产，自然不能靠自身的资本积累得以扩展。船政局建厂最初几年，还能按原合同进行生产，并较有成效，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其难以改善设备陈旧和工效不高的状态。船政大臣裴荫森在奏其情状时说：“厂中工作半资机器，机器之动必藉革带以制众轮。闽地濒海，燥湿靡常，天气燥则革带紧而轮转多，天气湿则革带松而轮转少，天气过燥而革带又易断而轮机停。转多则工程速，转少则工程慢，转停则工程愈慢……”可见设备更新的要求已十分迫切，而且所造船只也屡被传喧“糜帑实多”^⑦，“成本高，不适用”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365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429页。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204页。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53页。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55页。

⑥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410页。

⑦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410页。